

疫情风险下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

解晓娜, 张跃, 丁毅, 郭永玉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要】 目的: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疫情上升期民众的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及政府责任归因的中介作用和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方法:**通过问卷法使用系统依赖问卷、系统合理信念问卷、政府责任归因问卷和风险感知问卷对933名被试进行调查。**结果:**直接效应显示系统依赖正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间接效应显示系统依赖通过政府责任归因负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政府责任归因起遮掩效应;间接效应受到风险感知的调节,疫情风险感知较高时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显著,而风险感知较低时效应不显著。**结论:**民众对系统的高依赖可以增强系统合理信念;而当民众感知到较高的疫情风险时,系统依赖又会通过提高对政府的责任归因削弱系统合理信念。**【关键词】** 新冠疫情;系统依赖;系统合理信念;政府责任归因;风险感知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4.033

The Effect of System Dependence on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XIE Xiao-na, ZHANG Yue, DING Yi, GUO Yong-yu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ystem dependence on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ur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pidemic. **Methods:** 1,562 adults took part in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s measured system depend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risk perception. **Results:** The direct effect showed that system dependence would accelerate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Attribu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had the suppress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dependence and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The risk percep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moderating the indirect effect of attribu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To be more specific, when risk perception was high, system dependence would attribute more responsibility to governmen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dependence and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would be significant, but when risk perception was low, system dependence would not predict attribu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would not be significan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isk perception cannot be found in the direct effect of system dependence. **Conclusion:** Higher dependence of the public on the system can strengthen the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and when the public perceives a higher risk, the system dependence will weaken the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by increasing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COVID-19; System dependence;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Risk perception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打破了全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对个体而言,应对疫情的扩散固然需要做好自身防护,但更加高度依赖政府的防控措施。根据系统合理化理论的观点,个体对某个系统的高依赖会提高其系统合理信念(system-justifying belief),即民众越认为自身的结果依赖于所处的系统则会越相信该系统是正当的、合理的^[1]。系统合理信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同时显著负向预测焦虑和抑郁^[2]。因此,在疫情期间可以起到缓解民众不确定性、恐慌和焦虑的作用。而疫情的迅速发展也暴露了一些社

会问题,这反而可能会让民众对社会系统和政府的信心、信任程度下降。那么在疫情发展的上升期,民众对社会系统的依赖是否还会带来系统合理信念的提高?

系统合理化理论提出,人们普遍存在合理化和维护社会现状的动机^[3],在态度和认知层面表现为系统合理信念^[4]。系统依赖(system dependence),即个体认为系统对自身结果的影响程度,正是影响系统合理信念的重要因素之一^[1],但以往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

基于动机视角的理论观点,如果个体高度依赖于某个系统,系统的不合理或者对系统的质疑就会带来极大风险,所以为了减少存在性焦虑,人们会有一种合理化该系统的动机^[5]。实证研究也发现,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影响系统合理信念的心理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71971120);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心理建设研究”(20AZD084)
通讯作者:郭永玉,yyguo@njnu.edu.cn

依赖程度低的系统相比,人们会对自己依赖程度高的系统有更强的维护其合理性的动机^[1]。在阅读了强调政府对个人成就和幸福感有极大影响的材料后,被试会更加支持政府的政策^[6]。因此,疫情暴发后,人们可能会更加相信个体需要依赖所处的社会系统特别是政府来应对,这种依赖可能提升民众维护系统正当性、合理性的动机,并表现为系统合理信念的上升。

然而从认知视角来看,民众的政府依赖也有可能降低系统合理信念。期望差异理论认为,民众的满意度=感知质量-民众期望^[7]。也就是说,对政府的满意度依赖于感知到的政府表现质量超出期望的程度。汶川地震后针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也发现,民众的高期望会造成对政府的满意度降低^[8]。因此,面对疫情的迅速发展,系统依赖较高的个体可能对政府所需承担的责任抱有更高的期望;而在感知质量相当的情况下,系统合理信念可能就会更低。基于此,政府责任归因可能在系统依赖负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疫情上升期民众系统依赖的提高,会增加对政府的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根据情境危机沟通理论,人们在遭遇突发事件时,总是会去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归属,即进行责任归因,而对责任主体可控性和能力的感知会正向影响责任归因程度^[9]。高系统依赖的个体往往更加倾向于认为政府对疫情是具有控制力的,因此可能会更强调疫情防控中政府的责任^[10]。同时,对于认为社会系统对自身结果具有决定作用的个体而言,政府防控疫情不力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威胁和损失,他们对系统中出现的问题更加敏感,也更加不能接受犯错^[11]。因此在疫情急速发展的上升期,系统依赖越高则对政府作出的责任归因可能越多。

民众对政府的责任归因又会进一步削弱对政府的正向认知和态度。例如,当认为事件是由组织的原因所引发时,公众会对组织产生更少的支持性信念与行为^[9]。在一项研究中,当被试主动将事故责任归因于相关组织时,进一步导致了被试对组织的反对和批评^[12]。因此,本研究假设,政府责任归因可能起到中介作用:即疫情上升期民众系统依赖的上升会提高对政府的责任归因,进而降低系统合理信念。

围绕系统合理信念的研究发现,动机路径和认知路径可以同时发挥作用^[13]。基于上述分析,在疫情上升期可能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动机层面,为了缓解焦虑等消极情绪,高系统依赖的个体系统

合理化动机更强,即系统依赖正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假设1);认知层面,高系统依赖的个体会更加强调政府对疫情的责任从而损害系统合理信念,即系统依赖通过政府责任归因负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假设2)。本研究认为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正向直接效应(动机层面)和负向间接效应(认知层面)可能同时存在,并可以通过统计分析进行分离。统计学者将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方向相反而导致总效应不显著的现象称作“遮掩效应”,并将其视作广义中介效应的一种^[14]。国内外均有心理学研究发现了此类效应^[15,16]。本研究假设,政府责任归因在系统依赖和系统合理信念之间存在“遮掩效应”(假设3)。

然而,上述假设虽然可以回答系统依赖如何影响系统合理信念的问题,却不能回答两者间的关系在疫情的情境下是否有其特殊性,或者是否受到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引入“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作为调节变量。

风险感知是人们对所面临的风险作出的主观认识和判断^[17],或者说是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知觉。风险感知既存在个体差异,也会随疫情发展而波动,影响其他心理活动。当个体感知到较高的疫情风险时,往往会更加倾向于依赖社会系统,但根据前文的分析,系统依赖的上升未必会提升民众的系统合理信念。而与此同时,疫情上升期民众的风险感知也可能调节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作用。

风险感知调节动机层面的直接效应。当感知到疫情风险较高时,越依赖系统的个体,系统不合理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就会越大,比如对于底层民众,如果社会系统不是公正的合理的,那么就无法帮助他们抵御疫情的威胁,此时通过系统合理化缓解消极情绪的动机会更强^[18]。同时,高风险也会暴露出个体对疫情的相关信息掌握不足,而当人们面对不了解的问题时,系统依赖会增加系统合理化和政府信任^[19]。因此,相较于风险感知较低的个体,高风险感知的个体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直接效应更强(假设4)。

风险感知调节认知层面的间接效应。以往研究发现,当突发事件带来严重后果时,民众会做更多的责任归因^[20]。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系统依赖可以正向预测政府责任归因^[21]。因此,当感知到疫情风险较高时,高系统依赖的人会更加强调政府的责任,进而导致更低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当感知到疫情风险较低时,无论是否依赖系统,个体进行责任归

因的倾向都较低,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也较小。因此,相较于风险感知较低的个体,高风险感知的个体系统依赖对政府责任归因的预测作用更强,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也更强(假设5)。

综上,基于系统合理化理论和情境危机沟通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在疫情上升期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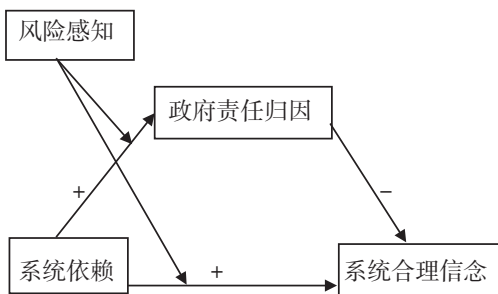


图1 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模型

1 方 法

1.1 被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新冠疫情期间民众社会心理调查”数据库,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被试在2.11-2.12期间通过腾讯问卷平台作答。剔除用时过短(每题平均不足3秒)和注意力检测题作答错误的问卷后有效问卷933份,其中男性582人,平均年龄 29.61 ± 8.17 岁。

1.2 研究工具

系统依赖的测量问卷改编自Shepherd和Kay编制的系统依赖量表^[19],包括3个题项,如“为了彻底摆脱此次疫情的威胁,我们非常依赖政府改善当前困境。”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将3个项目($\alpha=0.64$)的平均分作为系统依赖水平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系统依赖水平越高。

系统合理信念的测量问卷改编自一般系统合理化水平量表^[22-24],选取其中3道题并改编为疫情情境,题目如“从此次疫情的应对来看,中国社会整体是公平的。”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其中1个项目为反向计分,将3个项目($\alpha=0.66$)的平均分作为系统合理信念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系统合理信念水平越高。

政府责任归因的测量,要求被试对影响疫情扩散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分,其中政府责任归因包括3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1=非常不重要,7=非常重要),

将3道题($\alpha=0.70$)的平均分作为政府责任归因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对疫情的政府责任归因越高。

风险感知的测量问卷改编自灾害风险感知量表^[25],包括6个题项,如“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威胁你或家人的生命安全?”采用7点计分,将6道题($\alpha=0.63$)的平均分作为风险感知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疫情给个人造成的风险程度越高。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系统依赖与政府责任归因显著正相关,政府责任归因与系统合理信念显著负相关,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相关不显著。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972)

变量	M	SD	1	2	3	4
1. 系统依赖	5.12	1.26				
2. 政府责任归因	4.23	1.46	0.15***			
3. 系统合理信念	5.57	1.15	0.03	-0.44***		
4. 风险感知	4.65	0.94	0.19***	0.28***	-0.16***	

注:*** $P<0.001$ 。

2.2 直接效应与遮掩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对中介分析的建议^[14],即使变量间的总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仍可能存在,此时应当以遮掩效应立论,且遮掩效应属于“广义的中介效应”,可以使用与中介效应相同的检验流程和方法。因此本研究中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4进行检验。根据Hayes的建议^[26],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检验(抽取5000个样本)。结果显示,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直接效应显著 $\beta=0.10$, $SE=0.03$, $t=3.24$, $P=0.001$, 95% CI=[0.04, 0.15],假设1成立;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6, $Boot SE=0.01$, 95% CI=[-0.09, -0.04], $Z=-4.48$, $P<0.001$,假设2成立;同时纳入系统依赖的直接效应和政府责任归因的中介效应后,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总效应不显著, $\beta=0.03$, $SE=0.03$, $t=0.80$, $P=0.423$, 95% CI=[-0.04, 0.09],假设3成立。

2.3 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

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PROCESS中的模型8检验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见表2),系统依赖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对政府责任归因的预测作用显著;但这一交互项对系统合理信念

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假设4不成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显著, $\text{index}=-0.03$, $\text{Boot SE}=0.01$, $95\% \text{ CI}=[-0.06, -0.01]$ 。

为进一步解释系统依赖与风险感知对政府责任归因的交互作用,简单斜率检验发现:风险感知低分组(M-1SD)的系统依赖对政府责任归因的作用不显著, $\beta_{\text{simple}}=0.02$, $\text{SE}=0.05$, $t=0.43$, $P=0.669$, $95\% \text{ CI}=[-0.07, 0.11]$,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见表

3);而风险感知高分组(M+1SD)的系统依赖对政府责任归因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beta_{\text{simple}}=0.19$, $\text{SE}=0.05$, $t=4.12$, $P<0.001$, $95\% \text{ CI}=[0.10, 0.28]$,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显著(见表3)。以上结果表明,风险感知可以调节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风险感知较高时,系统依赖可以通过正向预测政府责任归因而负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风险感知较低时,该效应不显著,假设5得到支持。

表2 风险感知调节政府责任归因在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之间间接效应的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R	R ²	F	β	95%CI		t
						下限	上限	
政府责任归因	系统依赖	0.30	0.09	31.68***	0.10	0.04	0.17	3.22**
	风险感知				0.25	0.19	0.31	7.81***
	系统依赖×风险感知				0.08	0.02	0.14	2.62**
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依赖	0.45	0.21	120.32***	0.10	0.05	0.16	3.49***
	风险感知				-0.06	-0.12	0.005	-1.81
	政府责任归因				-0.44	-0.50	-0.38	-14.47***
	系统依赖×风险感知				-0.001	-0.06	0.05	-0.04

注:** $P<0.01$, *** $P<0.001$;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表3 在风险感知不同水平上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

风险感知	间接效应值	Boot SE	Boot 95%CI 下限	Boot 95%CI 上限
M-1SD	-0.01	0.02	-0.05	0.04
M	-0.05	0.02	-0.07	-0.02
M+1SD	-0.08	0.02	-0.13	-0.04

3 讨 论

本研究揭示了疫情上升期间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从动机和认知两个视角回答了系统依赖如何影响系统合理信念,揭示了政府责任归因的遮掩效应;同时也回答了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如何受到疫情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了解疫情上升期民众的社会心理特征及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以往研究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对于负性情绪有一定的缓冲作用^[27]。疫情期间,民众不可避免的出现悲伤、绝望、抑郁和焦虑等消极情绪^[28, 29],此时更加需要关注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发现,疫情中民众的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或削弱,而是存在两种不同路径。在动机路径,系统依赖可以提升系统合理信念;而在认知路径,由于系统依赖会增加对政府的责任归因,反而降低系统合理信念。以往研究中也发现了在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因素中,同时存在动机和认知两种相互独立的机制^[13]。基于系统合理化理论对系统

合理信念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大部分是从动机视角出发,比如个体控制感的缺失会激活系统合理化动机,从而提高系统合理信念^[5]。本研究发现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直接效应为正向,与该观点一致。但也有学者从认知视角对系统合理化开展研究,比如Hussak和Cimpian发现个体会对某个系统中的不平等现状进行内在启发式的归因解释,这导致他们对系统现状有更多的合理化^[30]。本研究关注了对于疫情的责任归因这一认知因素,发现系统依赖可以通过增加对政府的责任归因而降低系统合理信念,这与情境危机沟通理论的观点相一致。

研究中发现,风险感知对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系统依赖的动机作用不易受到认知层面的影响^[31]。即使是认为疫情风险较低的情况下,质疑自己所依赖的系统的合理性正当性也会威胁到个体的认识、存在和关系需要^[3],因此这一动机并不会随着疫情风险的提高而发生大的波动。研究证实了风险感知对政府责任归因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对风险感知较高的个体,越依赖系统就会越强调政府在疫情中的责任,进而削弱系统合理信念;而对风险感知较低的个体,该效应不成立。这也表明,在风险感知较低的时候,只有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直接效应,也就是动机路径起作用;而当人们感知到了较高的风险时,进行责任归因的倾向也

较高^[32],此时,越依赖系统的个体,就会越强调政府的责任,从而降低了系统合理信念。此外,研究中也发现风险感知可以正向预测系统依赖,当人们感觉到疫情风险很高时,往往会更加依赖政府和社会的力量。

本研究在以往关于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责任归因在其中的作用,对系统合理化理论进行了拓展。同时结合疫情发展这一特殊社会情境,发现在高疫情风险感知情况下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对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也有一定的启示:疫情风险越高,就越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来避免由于政府责任归因而导致的系统合理信念下降。

参 考 文 献

- Friesen JP, Laurin K, Shepherd S, et al. System justific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its contextual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9, 58(2): 315-339
- Vargas-Salfate S, Paez D, Khan SS, et al. System justification enhances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in 18 count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8, 57(3): 567-590
- Jost JT. A quarter centu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Questions, answers, criticisms, and societal ap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9, 58(2): 263-314
- Kay AC, Jost JT.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motivational sci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s one of many "autonomous motivational structur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4, 37(2): 146-147
- Kay AC, Friesen J.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Understanding When System Justification Does and Does Not Occur.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0(6): 360-364
- Kay AC, Gaucher D, Peach JM, et al. Inequality,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status quo: Direct evidence for a motivation to see the way things are as the way they should b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3): 421-434
- Filtenborg AF, Gaardboe F, Sigsgaard-Rasmussen J. Experimental replication: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 of citizen satisfactio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7, 19(9): 1235-1250
- 张欢, 张强, 陆奇斌. 政府满意度与民众期望管理初探——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案例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8, 6: 99-104
- Coombs WT. The Protective Powers of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 Managing Reputational Assets During a Crisis. *Journal of Promotion Management*, 2006, 12(3-4): 241-260
- Kay AC, Gaucher D, Napier JL, et al. God and the government: Testing a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95(1): 18-35
- Ding Y, Savani K. From variability to vulnerability: People exposed to greater variability judge wrongdoers more harshl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Schwarz A. How publics use social media to respond to blame games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 Love Parade tragedy in Duisburg 2010.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2, 38(3): 430-437
- 杨沈龙, 郭永玉, 喻丰, 等. 系统合理化何以形成——三种不同的解释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12): 2238-2248
-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Salgado JF, Blanco S, Moscoso 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Job Performance: Testing of a Suppressor Effect. *Revista de Psicología Del Trabajo y de Las Organizaciones*, 2019, 35(2): 93-102
- 陈必忠, 郑雪. 大五人格与大学生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失败: 错失恐惧的作用. *应用心理学*, 2019, 25(2): 161-168
- 谢晓非, 郑蕊, 谢冬梅, 等. SARS中的心理恐慌现象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 4: 628-639
- Wakslak CJ, Jost JT, Tyler TR, et al. Moral outrage mediates the dampening effect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on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ve social polic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 18(3): 267-274
- Shepherd S, Kay AC. On the perpetuation of ignorance: System depend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motivated avoidance of sociopolitic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2, 102(2): 264-280
- Coombs WT, Holladay SJ. Helping Crisis Managers Protect Reputational Assets: Initial Tests of the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2, 16(2): 165-186
- Cheng P, Wei J, Ge Y. Who should be blamed?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a city smog event in China. *Natural Hazards*, 2017, 85(2): 669-689
- Kay AC, Jost JT. Complementary justice: Effects of "poor but happy" and "poor but honest" stereotype exemplars on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implicit activation of the justice mo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5): 823-837
- 杨沈龙, 郭永玉, 胡小勇, 等. 低阶层者的系统合理化水平更高吗?——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的考察. *心理学报*, 2016, 48(11): 1467-1478

-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win Research & Human Genetics*, 2010, 13(2): 143-162
- 15 Adams N, Little TD, Ryan RM.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Development of self-determination through the life-course. Springer, Dordrecht, 2017. 47-54
 - 16 Siedlecki KL, Yazdani N, Minahan J, et al. Examining processing speed as a predictor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age and time in the German Aging Survey. *Aging,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2020, 27(1): 66-82
 - 17 李文华, 王丽萍, 苑杰.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4, (7): 1067-1070
 - 18 Erikson E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Oxford, England: Norton & Co, 1968
 - 19 王美萍, 张文新. 青少年期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合的发展特征. *心理科学*, 2007, 30(5): 1196-1198
 - 20 Laursen B.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conflict on 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1993, 39(4): 535-550
 - 21 Chung, Flook, Fuligni, et al. Reciprocal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and peer conflict in adolescents' daily lives.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5): 1390-1396
 - 22 Lerner RM.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3rd E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 23 Zimet GD, Dahlem NW, Zimet SG,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8, 52(1): 30-41
 - 24 方晓义, 董奇. 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的亲子冲突. *心理科学*, 1998, 21(2): 122-125
 - 25 董奇, 林崇德.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标准化测验简介. 科学出版社, 2011
 - 26 Hansen T, Slagsvold B. The ag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aradox revisited: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Norsk Epidemiologi*, 2012, 22(2): 187-195
 - 27 Cheung I, Campbell L, LeBel EP, et al. Registered replication report: Study 1 from finkel, rusbult, kumashiro, hann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6, 11(5): 750-764
 - 28 Gaertner AE, Fite PJ, Colder. Parenting and friendship quality as predictors of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symptoms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010, 19(1): 101-108
 - 29 Alcantara S, González-Carrasco, Montserrat M, et al. Peer violence i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Northeastern Brazil.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7, 18(5): 1507-1532
 - 30 Lucas RE, Dyrenforth PS, Diener E. Four myths about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08, 2(5): 2001-2015
 - 31 Fredrickson BL.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04, 359(1449): 1367-1377
 - 32 Chung GH, Fuligni AJ. Reciprocal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and peer conflict in adolescents' daily lives.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5): 1390
 - 33 Diener E, Biswas-Diener R. Happiness: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psychological wealth.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 (收稿日期: 2020-09-08)
-
- (上接第833页)
- 24 Cichocka A, Górska P, Jost JT, et al. What inverted 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 system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5(5): 883-902
 - 25 Lin S, Shaw D, Ho MC. Why are flood and landslide victims less willing to take mitigation measures than the public? *Natural Hazards*, 2008, 44(2): 305-314
 - 26 Hayes A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3
 - 27 Napier JL, Bettinsoli ML, Suppes A.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2020, 34: 129-134
 - 28 胡心怡, 陈英和. 大学生疫情压力感知、心理灵活性对抑郁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4): 739-742
 - 29 易晓明, 席居哲, 薛璟. 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学生的情绪、学习/研究状态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6): 1254-1260
 - 30 Hussak LJ, Cimpian A. An early-emerging explanatory heuristic promote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5, 109(5): 739-752
 - 31 van der Toorn J, Tyler TR, Jost JT. More than fair: Outcome depend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authority figur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1, 47(1): 127-138
 - 32 Rothschild ZK, Landau MJ, Sullivan D, et al. A dual-motive model of scapegoating: Displacing blame to reduce guilt or increase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2, 102(6): 1148-1163
- (收稿日期: 2020-08-17)